

专栏 Column

责任编辑:沈飞昊 美编:蒋玉磊 2006.9.1 星期五
邮箱:flyhow@ssnews.com.cn 电话:021-38967626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 说言论

经济结构性失衡日益突出 ——盛世危言之二

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3年保持了9%以上的高增长,但与此同时,结构矛盾加剧,成为宏观调控的一大起因。然而,宏观调控措施实行以来,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结构问题:投资、信贷和外贸顺差增长过快,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均衡,结构性失业比较严重,对外贸易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这些结构性矛盾在2006年依然有增无减。

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9.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8.4%,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2.15万亿元,占全年贷款增长目标的86%;外贸顺差持续增长,上半年累计达614亿美元,同比增加218亿美元。

按第一、二、三产业划分的投资增速,今年上半年分别是40.2%、35%和28.2%。农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一季度同比增长47%)符合政府关注农业和农村的战略。但是,农业只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而且上半年农村地区的总投资同比增长了18%,相

比之下城镇地区增长30%。企业留存利润还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占总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一半(占明确资金来源的60%)。国内的信贷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比重由2005年的19%,上升到27%,而新增贷款的相当大比例流向房地产业。

贸易部门(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的增长率为36%,而2005年增长率为39%。在非贸易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长率却没有这么强劲,比如服务业为28%,包括房地产业(20%)和公用事业(头两个月为12%)。近五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消费增长则一直落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10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为59.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将近20个百分点。尽管去年国家公布了经济数据的普查结果,消费需求在总体上还在呈进一步下降趋势,消费需求所占GDP比重已下降到了52%左右水平。

出于种种考虑,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政府并没有采用真正的宏观调控手段,而是以行政手段控制局部投资增长过热。

但无论从总量还是从结构上来看,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不仅投资过热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而且行政措施的效果还在逐渐减弱。

推动投资过热除了宏观上储蓄率居高不下等基本原因外,还有一些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
(1) 地方分权以及财政联邦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导致地方竞争不断升级,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微观机制。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因而主动被动地更加转向房地产等卖地收入追求,转向招商引资等税收收入追求,而以GDP增长作为考核政府官员绩效标准的主要方面引发政府机会主义,是权力与资本结盟,地方投资畸形冲动的长期动力。

(2) 长期低利率政策造成对投资实质性的补贴。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之低在亚洲仅次于日本,根据中央银行的货币执行报告,减去通货膨胀率后,真实利率远远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分之十几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这实际上助长了贷款和投资需求,甚至于投资原本不应该进行投资的项目。
(3) 出口退税和外贸制度的



“加速器”效应。在改革开放初期“双缺口”时期实行的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的政策时至今日仍在不讲条件地沿用,鼓励出口的退税政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两免三减”,形成经济增长对制造业投资的过分倚重和事实上的补贴。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在出口环节,中央财政负担了全部退税,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退税责任,所以出口越多,所得退税额度也就越大,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地方政府为获得出口的利益增加不惜大打出口争夺战。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失衡也加大了人民币投机压力,为投机人民币升值,经营外贸的企业可以以低报进口产

品价格、高报出口产品价格的方式,合法地由此获得的外贸盈余兑换成人民币,也是顺差螺旋式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投资过高可能还与国有企业体制有关。即在出资人逐渐到位后,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利润增长过快,但又有全部转化成收入和消费,因此形成新增投资。不过,这是相对比较短期的一个原因,投资过高的深层次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现行的以国有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僵化体制。
(本文内容源自笔者与北京科技大学陈光磊先生的合作研究报告)

■ 一言难尽



◎傅勇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中国城镇化模式两个反向试验

带到了中国这个普通的乡村。这个经验曾在二战之后有效地消解了西德乃至整个欧洲城乡差距拉大、大量农业人口涌向城市等社会问题。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并从1990年起成为欧盟农村政策的方向。在目前的巴伐利亚地区,农村地区占州总面积的80%以上,为近60%的人口提供居住、工作和生活空间。

“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经历了15年实践,全村的公共设施已十分完善,创办了100多个小企业,农民“白天上班,下班下地”,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位于温州市苍南县的龙港,是一座几乎全部由农民集资新建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中期90%以上劳动力从事农业渔业生产,工业近乎空白。1984年建镇之初,即打出“鼓励农民带资进城开厂办店”的口号,打破传统户籍制度的壁垒,解除了传统体制对农民进城的各种束缚,一方面可将耕地包给种粮大户规模经营,另一方面由不起眼的商品起步,放手培育市场。2002年以来,龙港因

印刷、纺织等区域特色经济的出色经营先后被命名为“中国印刷城”和“中国礼品城”。今天,龙港已发展成人口超过23万、经济规模接近100亿元的明星城镇,从外地雇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占全镇从业人数总数的近一半。

然而,龙港在迅猛发展之后,传统城市管理体制也在这里随之得到迅速复制,加之人们对行政区划和财税体制等方面变革的不确定预期,龙港将来的发展面临着“体制之痛”。

应该说,上述两种城镇化模式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城镇化,而在于城镇化应该是在农村普遍推行,还是由市场机制自发生成像龙港这样的城市而实现。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有人认为南张楼模式对于建设一个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预示着某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市化并不等于非农业化,安居乐业不必都往城里挤,农村可以通过城镇化把农民留在土地上。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模式的成效并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政策蕴涵。

德国人在南张楼推行试验

的本意是要让农民留住土地的同时,享受一种与城市居民不同但同样充实的生活。他们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是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农村居民只是因为欣赏农村的这种生活方式才乐于选择乡村生活。这显然和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格格不入。实际上,光靠土地是留不住农民的,南张楼建立了一百多个工厂,正是这些工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吸引了青年农民,出国打工致富的人回村后把钱投进工厂,而不是土地上,这些是德方所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虽然南张楼村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但村民大都还是愿意往城市里走,城市里的设施毕竟全。再说,“孩子还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好。”村里挣钱多的,都在城里买了房子。

虽然目前这两个试验的未来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所面临的困难的性质是不同的。南张楼面临的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自然约束(所以只有通过发展离土不离乡的非农产业来缓解)以及城乡生活方式难以抹去的差别(富裕的村民对城市生活仍极其向往),

这些困难是难以克服的;而龙港受到的却是体制的束缚,正是我们应改革的对象。实际上,解决南张楼困难的根本途径正体现在龙港的覆辙之中。龙港的城市化代表了市场的趋势;城乡差距的存在和拉大本就说明市场在城乡之间是不平衡的,就应该创造机会让农民洗脚进城,南张楼村以农村为立足点的模式终究会受人多地少和传统体制的约束,城乡二元结构终难破除。这种模式或许能在个别地区成功实行,但不应成为政策的立足点,因为,让近8亿农民中的大多数留在土地上是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背道而驰的。

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综合在一起加以比较,人口在100-400万左右的城市,综合效益最好,而小城镇效益最差。因此,普遍推行人口在小城镇就业的南张楼模式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可行的战略是逐步拆除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障碍,在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中部等地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充分吸收农村剩余人口。

■ 管窥一得



◎管清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博士生

俄罗斯石油帝国大戏吗?

份额分别达15.2%和25.8%。如此庞大的市场份额足以让莫斯科另起炉灶了。

非但如此,克里姆林宫还要彻底“打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本来建立以卢布结算的石油交易所就是挖美国霸权和美国霸权的墙脚了,而俄罗斯准备将“斗争”进行到底,干脆连欧佩克的墙脚也挖。有消息称,俄罗斯首先要推动独联体各国之间的石油天然气贸易以卢布结算。接下来把卢布结算扩展到与亚洲和欧洲的石油贸易。再下来就要争取与伊朗、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以及墨西哥等产油国组成以卢布作为结算货币的石油联盟。这些国家都是欧佩克成员,而且其反美政策是一贯的。本来委内瑞拉已经在查韦斯的领导下用石油和12个拉美国家(包括古巴)建立了易货贸易机制,俄罗斯的新战略岂不是给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然,美国40%左右的石油进口来自拉美国家,其中主要是

委内瑞拉。20%来自中东地区,并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维持加拿大、墨西哥对本国的稳定能源供应。墨西哥如果也“反水”,美国的能源安全就不安而危矣!

俄罗斯的理由非常充分,而且听起来冠冕堂皇。石油贸易是俄罗斯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引擎,如果贸易的标价权掌握在美国手里,俄罗斯随时都有可能遭受损失,其经济增长的引擎随时可能熄火。美国完全可能通过美元贬值缩小自己的贸易赤字,以缓解双赤字的困境。历史上,为了平衡对德国和法国的贸易赤字,华盛顿曾经让美元大幅度贬值。据转型经济研究所的计量经济模拟分析显示,若2009年石油价格是每桶25美元,则俄罗斯联邦政府收入减少9%;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7%;稳定基金为零;通货膨胀率达到40%。

还有一种担心,俄罗斯没有言明。当年苏联的解体与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有直接关系。而十年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国。美国联合沙特,控

制国际油价,恶化苏联的国际收支,实现了对苏联不战而胜的目的。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则是其中关键之关键,莫斯科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俄罗斯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依然会被美国看作竞争对手之一,面对近年来俄罗斯依靠能源出口而日益恢复的国力,白宫岂能无动于衷?俄罗斯要做的,就是抢在美国动手的前头,让石油卢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石油美元。

如果顺了俄罗斯野心勃勃的设想,一个新的欧佩克将会紧密地团结在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石油帝国周围,不但原有的国际能源格局将会被彻底“打烂”,整个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也会被改变。

世人应该对俄罗斯给乌克兰“断气”记忆犹新吧。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进口大国,比如美国等等将面临一场巨大的挑战。不过问题也有好的一面,当然要看对谁而言,从哪个角度说了。国际石油市场增加了与欧佩克旗鼓相当的

竞争者,对于石油进口国而言也许是件好事,大可不必悲观。这给石油进口国分散石油供给风险,保证石油供应的多元化提供了一条渠道。

俄罗斯行吗?其目标能实现吗?这要看欧佩克如何应对了,还要看美国、中国这些主要石油进口国如何应对了。如果欧佩克想要制约俄罗斯,那就必须拥有和俄罗斯建立的新欧佩克至少同样对市场的影响力。而且,欧佩克还要与美国协调,因为其结算货币依然是美元。欧佩克能和美国联合起来吗?比较难。即便欧佩克内部成员国之间协调一致都很难,更不用说对外联合了。

历史正在给俄罗斯提供一次绝好的机会,而这又是苍天所赐,几乎不可复制。所以,我估计俄罗斯可能会建立一个石油帝国。但是,俄罗斯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产业结构的单一,“荷兰病”,以及其扩张的民族秉性等,是否能够据此优势恢复以往的荣光就很难说了。

■ 乱弹

凯雷以外的悬念



◎周丽华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部副总经理
上海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美国凯雷集团收购徐工集团控股一波三折,久拖不决,各方争论得很厉害。这事究竟该怎么看?我只想从并购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说起来,我从来不曾认为凯雷收购徐工的方案会被中国商务部否决,我相信凯雷集团本身也不曾为此担心。凯雷是一家在美国政界有极其深远影响的公司,凯雷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使它对收购徐工集团股权的申请获准充满信心。

或许有些人还在对前年美国否决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申请而感到愤懑,可是,难道我们因此就该否决凯雷收购徐工的申请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倒是我们的失误了。2001年美国遭遇了“9·11”袭击,从此以后,美国社会上上下下从整体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利坚不再是一个主张开放的国家了,转而搞起了封闭,开始怀疑和跟踪外国人,开始防范外国公司,排斥外国资本介入美国的某些产业。这不再是以前我们熟悉的那个主张开放经济的美国了,而是一个走向自我封闭的美国。倘若这种情形持续下去,这将是美国走向衰落的起点。

1200多年前,唐代的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主张开放的国家,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提倡货物自由贸易和人员自由往来最积极的国家,各国人民都愿意“耕于王者之田”,唐朝因此而强大起来。直到由胡人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我们才开始怀疑和防范外国,中国也由此走向封闭和衰落。假若美国坚持现在的对外政策,那将注定重蹈中国唐王朝1000多年前的覆辙。因此,我们才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胸怀,欢迎世界各国优秀的企业来中国发展,来中国竞争,这样的局面只会对中国有利。

就像资本要寻找合理估值的资

■ 杂样儿

撒野的分寸



◎张晓晖

中银国际证券金融分析师
居居天津

合资企业鸿富锦因被揭非法用工而起诉记者且天价索赔,挑战舆论监督,传媒界同气相求,一时间平地风雷,大波壮阔。眼见犯了众怒,忽又戏剧性地将索赔金额减为象征性的1元,增列记者所在的媒体为被告。

鸿富锦究竟为什么如此理直气壮,如此威风?别忘了,报纸是社会公器,千千万万人心里有本账,社会还有舆论,俗话说干夫共指,不病而亡。后果就不掂量掂量?有学者怀疑,这样做的目的是追求广告效应,究竟是不是,不得而知。但真要做广告,难道可以通过践踏社会公道的方式来做吗?就好比您想出名,想征婚,实在没辙了,脱光了来上一把“裸奔”,名倒是出了,地球人都知道您了,您还找到对象?这下好了,不仅台湾省,整个中国都知道您了,靠此广告真能给您带来订单吗?从前,药店年年舍药,为什么?通过学雷锋做好事来达到做广告的目的,如果都“裸奔”一把或撒点野就能把东西卖出去,传媒业早喝西北风了。您折腾半天,给谁做广告呢?被起诉的媒体和那两位记者,一下子名满天下不用说了,人家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有责任感、正义感、使命感。您这不是买了炮仗让别人放吗?

再说回来,闹这么邪乎,就不怕被別人盯上,如果劳动部门抓住不放,那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前面您打官司,后面官司打您,前面查

产和项目去投资一样,资产本身也在寻找适合经营的资本和企业家。我们凡事要因地制宜,寻找适合这片土地上发芽的树种,这样才能营建一片森林。我们把徐工集团视作一项资产,就需要寻找最能够经营这些资产的资本,最合适这些资产的基因。一旦我们找到这样的经营者,就应该把这项资产交给他经营。为此,出价的过程是一个选择优质基金的过程,那个出价最高的买家往往具有最强的经营能力。因此,我们看到高换手率的资产往往将来会有更大的涨幅,但是这个涨幅是这项资产当前的经营者所不能实现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是交易本身的问题,要把资产交给最有能力的经营者。

如果我们今天讨论徐工是否被贱卖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凯雷高价出售时再次讨论相同的问题。只要程序合法,操作透明,其中没有违规的猫腻,那么我们就该对这笔交易注入太多的情绪化的讨论。当然,人民币汇率偏低,导致凯雷集团用即将贬值的美分换取了我们的实物资产,也可能使该项交易的成交价在未来显现出低估的情况,那倒是我们的失误了。

2001年美国遭遇了“9·11”袭击,从此以后,美国社会上上下下从整体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利坚不再是一个主张开放的国家了,转而搞起了封闭,开始怀疑和跟踪外国人,开始防范外国公司,排斥外国资本介入美国的某些产业。这不再是以前我们熟悉的那个主张开放经济的美国了,而是一个走向自我封闭的美国。倘若这种情形持续下去,这将是美国走向衰落的起点。

当前,我国许多并购交易的主要撮合者是国资委,国资委掌握了资产、经营者和资金。国资委代替了市场,成了中国的产业投资基金。如果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市场力量将“优质经营基因”、“存量资产”和“社会闲散资金”这三者结合起来,那将会是多么大的发展机遇啊!

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还有很多。最近媒体提到的外资并购洛阳轴承,为什么我们的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是可以的,而卖给中国人却政策障碍那么多呢?我们究竟是需要一个好的外国的基因呢,还是一个正确的激励机制?

这个悬念难道不值得我们细细反思吗?

封资产,后面请君入瓮,那时候就知道,玩儿大了,玩儿过头了,最后恐怕收不了场了,还有什么做?当初,格林柯尔对胡成平不依不饶,有拿笔的,有递话儿的,黑道白道云云,结果如何?“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始作俑者深陷囹圄。给,这回好了,有人给您站岗,有人给您送饭,还不用干活儿,舒服!

咱教教您吧,先登启事,一定整改,欢迎媒体监督,共建和谐企业,总之,就这么云云吧;然后抓紧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八月十五发点月饼,和缓一下,同时设法探讨一种既厚道又有效率的工作流程,作为企业管理、工业流程和市场营销的成功范例,马上进入MBA教材,一写进教科书,就不不朽了吗?这还不够,让大家伙儿都知道您闻过则喜,知错就改,广告效应不立马也出来了?难关也过去了,坏事变好事,多好啊?何至于出这么馊的主意?这不是活活摔死了么?

始作俑者弄巧成拙,贻笑大方。但这滑稽而荒诞的一幕无疑给媒体乃至方方面面一个警示,也出了一个案例。

众所周知,一向向法院执行难,咱也理解。但这回看,一点儿都不难嘛,迅雷不及掩耳。企业提出查封资产,很霸道,但不违法,即使原告盛怒之下要把被告罚个倾家荡产,人家怎么想那是人家的权利。但问题是,原告怎样要求是人家的事儿,查封的决定可是法庭作出的。法院开庭以后怎么判?面对资本的魔力收放自如,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空间被大大压缩的冷酷现实,劳动主管部门又在哪儿?

这善后何其难也!

想对记者说是的,站直了,别趴下,没什么好怕的,因为这次挑战的不是个人,而是在挑战社会的正义和公道。